

《域外小说集》译介 ——读者期待视野的解读

叶依群

(浙江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23)

摘 要: 鲁迅和其弟周作人译介的《域外小说集》在 1909 年出版时并没有引起读者广泛的关注,对于读者的缺失,周氏兄弟和业界各有说法。为此,从读者期待视野探讨《域外小说集》,对其翻译文本、文学形式、翻译方法和翻译语体 4 个方面进行解读,比较全面地阐述《域外小说集》读者接受失败的原因。

关键词: 《域外小说集》;译介;读者期待视野;解读

中图分类号: I046;I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15)02-0113-05

Translation of *A Collection of Foreign Novels* from perspective of readers'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YE Yiq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A Collection of Foreign Novels* translated by Zhou brothers failed to attract the readers when it was published in 1909. To the absence of readers, Zhou brothers and scholars in literary circles had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ders'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a study of the works is made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selection of the novels, literary form, translation strategy and language style, thus the reasons why it failed to be accepted by the readers will be interpreted in a comparatively systematic way.

Key words: *A Collection of Foreign Novels*; translation; readers'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interpretation

《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和其弟周作人(下称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期间合作编选、翻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分第一集和第二集),收集了域外 10 位作家的 16 篇作品,1909 年在日本出版后,分别寄售于上海和东京两地,鲁迅作了一个“虽寥寥数语,但志向高远、气象阔大的”序^[1],并不惮其烦地去追踪读者,发现销售异常惨淡:东京第一集售出 21 本,第二集 20 本,上海也在 20 本上下,成为周氏兄弟译著发行量最少

收稿日期: 2014-09-23

作者简介: 叶依群(1963—),女,浙江省松阳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教学与应用翻译的研究。

的一部。尽管这部短篇小说集当时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和反响,甚至是大为失败的,谁也没有珍视之^[2],但在中国翻译史上却留下浓重的一笔,被誉为中国近代译论史上的重大文献^[3],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多国多作家短篇小说合集形式译介的著作^[4]。《域外小说集》在晚清译界湮没无闻,读者寥寥,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周氏兄弟和译界对此已有定评。至于其中的原因,各有说法。为此,笔者从读者期待视野探讨《域外小说集》读者缺失的原因,以期有一个更为合理的解读。

1 读者期待视野

传统文学理论主要从社会背景和作者视角评价作品,至于文学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及蕴含的内容,往往被忽略。20 世纪 60 年代,文学作品研究出现了以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伊瑟尔和姚斯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接受美学理论,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文学接受活动,以读者为中心,把文学研究的重点从以文本为中心转移到读者的接受上。读者是一切文学活动的中心,文学创作应为读者服务,不能脱离读者的需要^[5]。接受美学认为,在阅读文学作品前及阅读过程中,读者面对文本时,对作品内容和显现方式有一个定向性的预期,这就是期待视野^[6],是接受美学的核心概念。在作品阅读过程中,读者将文本具体化,文本才能成为文学作品,才能体现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因此,读者是整个文学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在译介《域外小说集》前,鲁迅充分考虑到了读者的重要性。在初版《序》中,鲁迅认为:介绍外国新文学,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7]。在文学活动中,译者提供的译文只有与读者的期待视野融合,才有可能被读者理解、认可和接受,才能发挥译文的作用。《域外小说集》之所以遭冷落,就在于它的期待视野超越了读者的接受能力。

2 从读者期待视野解读《域外小说集》的接受

2.1 翻译文本超越读者的期待视野

要实现翻译目的,必须翻译读者喜爱的作品。作为原文读者的译者,在选择阅读及翻译文本时,受自己的思维方式、生活风格和知识结构的影响,会倾向与自身修养、素质、心理、志趣、经验和个性等因素相符合的作品,即选择与自己“期待视野”相吻合的文本。在文学接受过程中,读者基于自己的期待视野对文本进行个性化解读,为了使翻译文本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译者有必要对读者定位,满足读者的审美心理,努力使翻译的文本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心理需求。

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作品选材比较散乱,译者大都根据读者市场和个人的喜好选择,随意性较大。源自欧美列强和日本,英美、法国、俄国、日本和德国 5 个来源的小说占总数的 96% 左右^[8]。当时由于译者不熟悉外国作家作品,对底本的选择缺乏批评鉴赏能力,往往就耳闻所及取材,以至将大量二三流作家作品翻译过来^[9]。周氏兄弟没有随波逐流,选择读者接受程度很高的侦探、言情等通俗小说,而是不问经典,独辟蹊径,注重于“异域文术新宗”的艺术性。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鲁迅表达了译介被压迫民族作者作品的动机,所求的是叫喊和反抗的作品,因而倾向了东欧的文学^[10]。周氏兄弟站在启蒙者高度,“特收录至审慎,迆译亦期弗失文情”^[11]。选择了 19 世纪中后期和 20 世纪初西方浪漫主义后的作品。《域外小说集》不仅包括了当时翻译界重视的英美小说,更重要的是重点介绍了当时不受人们关注的北欧和东欧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品。鲁迅看重的是作品是否切合中国现实的需要,感兴趣的是俄国和一些受压迫的弱小国家的作品。《域外小说集》共收英国、美国、法国、芬兰作家各 1 篇,俄国 3 位作家 7 篇,波兰作家 3 篇,波斯尼亚作家 2 篇,文本选择偏重斯拉夫系统,偏重被压迫民族。作者包括了俄国迦尔洵、安特列夫、契科夫,英国王尔德,法国莫泊桑,美国爱伦坡,波兰显克微支等,体裁有小说、童话、寓言等,皆为短篇。鲁迅认为这些是“为人生”的文学作品,不仅因为它们反抗强权,反抗压迫,还因为它们对弱者同情,为弱者呼号,很贴近中国的现实^[12],具有移情和涵养神思的作用。尽管这样,《域外小说集》却没能像《天演论》和《巴黎茶花女遗事》那样风靡全国,超前的翻译文本缺乏接受的土壤。

文本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吸引读者,因为它是阅读的前提。周氏兄弟译介的文本,选自读者最不熟悉

国家的文学作品,虽然具有超前性,体现了周氏兄弟独特的审美观,但与晚清读者的品位和阅读能力差别很大,读者接受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2.2 文学形式超越读者的接受能力

从文体上看,清末民初翻译小说占据重要地位,诗歌、戏剧翻译得较少。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有过统计:自1895年到1906年,出现翻译小说516种(部或篇)^[13],每种类型小说都有大量的翻译,它们以其新奇的内容吸引了大批的中国读者,阅读翻译小说成为一种消闲方式。周氏兄弟选择译介域外小说,是与读者的期待融合的。

然而,《域外小说集》并不被读者待见,对于读者接受失败的原因,鲁迅的解释是:“《域外小说集》刚出的时候,读过的人以为小说才开头,却已结束了!那时短篇小说数量很少,读书人习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小说,所以短篇小说在他们看来等于无物”^[14]。鲁迅将失败的原因归于其文学形式,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小说体裁以章回体为范本,晚清小说译界也以章回体翻译欧西小说,从晚清到“五四”,长篇小说仍然是译者选择翻译的对象。1909年前偶有短篇小说译作,但数量非常有限,而且都以单篇形式出现,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15]。读者长期阅读传统小说,养成了固定的阅读习惯,很难在短时间内接受新的小说形式。短篇小说作为一个独特的文类,对清末的读者来说的确是陌生的,超越了当时读者的接受能力。

晚清小说的阅读者以小职员、小市民为主,水平较低,阅读翻译小说是当作茶余饭后消遣的,读者只关注小说的情节,对艺术价值并不感兴趣,自然也分辨不出作品的优劣。为了迁就读者的阅读品位,在选择译介西方作品时,大多数译者选择英法国家那些吸引读者的、故事情节曲折的通俗小说,注重在艺术趣味上接近中国读者的作品,因此,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历史小说、军事小说等成了首选,而西方现代短篇小说,无论是审美形态还是叙述方式,与中国传统小说有很大差别。《域外小说集》选的都是短篇小说,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所选的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的欧洲文学作品着眼于苦难的或弱小民族,以一种新的叙事模式出现。这些有着强烈的主观性和抒情性的小说,表达人道主义情怀的个体生命体验,无论是内容还是情调都符合周氏兄弟所推崇的人道主义。所选小说不以故事情节取胜,而以叙事别致、充满诗意见长,侧重主观表现的象征主义手法,如《默》和《漫》,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小说大多没有完整的情节和严密的结构,除生活场景、人物主观的感觉与想象是不连贯的碎片式的外,小说叙述时还运用了意识流手法,这一切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是相当陌生的^[16]。例如:《安乐王子》故事较为完整,但缺乏结构,情节十分简单,大部分的篇幅都用在燕子和王子的对话上;《四日》是一个受伤的士兵遗留在战场上4天的感想,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只有一幕幕的简单、平淡的片段,很像意识流小说;爱伦坡的《默》,莫泊桑的《月夜》,几乎完全没有故事情节,只是刻意营造一种气氛和意境^[17],变幻、新奇、古怪等元素没有出现在小说里。因此,从形态上看,这些作品大都不像小说,更像诗,与晚清流行的一般小说旨趣完全不同。在情节小说化小说仍占翻译主流的清末民初,中国读者还不习惯欣赏注重描写内面生活的近代新体小说,《域外小说集》遭致冷落,也就不奇怪了。

2.3 直译方法不符合流行的意译风尚

翻译是一种再创作,为了使译作在本土文化语境中得到读者认同,充分实现翻译价值,译者在作品选择和翻译过程中,会自觉地关照其意向读者的期待视野并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

王宏志^[18]认为,《域外小说集》不为时人喜爱的一个关键理由在于其直译的手法,不符合当时流行的意译风尚。晚清时期,中国对外国文学译介刚开始,读者群的文化背景悬殊,阅读接受能力有限。当时翻译人才稀缺,大多数译者外语水平不高,精通双语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只能从英译本和日译本转译欧美文学作品。译者因缺乏外国语言、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知识,无法准确表达原文中的某些内容,囿于客观的环境,对翻译作品任意删削、颠倒、编译、改译等意译和达旨的翻译方法盛行。晚清对译作也没有一定的规范,译家各随其便,很少考虑翻译要忠实于原文。出于文学接受方面的需要,大多数译者会考虑译文读者传统的阅读习惯、审美情趣及道德伦理观,保证译文的可读性,翻译时按照自己习惯的话语规范重铸原

文,甚至对原著的情节,叙事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增删和改译,对外国人名、地名、称谓等进行本土化的处理等,意译的译述方法切合了晚清的接受氛围,更受译者和读者喜欢。

周氏兄弟致力于把“弱小民族”的文学译介到中国,向读者输入新的、异质的文化思想,引导读者接受新文化。为保证外来文化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扫荡翻译界的混乱观念,他们采取了直译的翻译策略。《域外小说集》完全放弃了以往编译和改译的翻译模式,提出“任意删易,即为不诚”,要求对原著忠实,采用“弗失文情”的直译,忠实地保留了原著的章节格式、内容和文采;系统地、有意识地采用了西式标点符号;在翻译人名和地名时,采取了直接的音译,而不是改用中国的人名地名;其直译法还体现在对小说形式样态、人物对话、翻译单位、小说虚实情节的照译等方面,减少了西方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损失和变形。许寿棠先生^[19]曾将鲁迅所译安特列夫的《默》和《漫》,迦尔询的《四日》的德译本进行过对照,认为:字字忠实原文,没有进行任意的增删,为翻译界开辟了新时代的纪念碑。由于当时意译占主导的翻译规范与读者阅读期待和语言结构等的制约,《域外小说集》没能获得多数读者的认同。

关注意向读者的期待视野,翻译的作品才能得到读者的接受或支持。采用不照顾读者的直译方法,翻译的作品可能不为大众欢迎,因为当时中国的读者,在接受外国的东西方面,其实还是很不成熟的^[18]。但周氏兄弟宁愿暂时受到读书界的冷落,也不去附和意译派的主张。

2.4 复古的语体影响读者的接受

古文被称为晚清时期的“行世之文”,从第一部翻译小说《听夕闲谈》(1873 年)至 19 世纪末的翻译小说都以文言为主,著名的翻译家林纾、严复的翻译文体均系文言。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小说界革命后兴起了清末白话文运动,文言译介外国小说受影响,出现了文、白并存的译语体式,有时同一本外国小说既有文言译本又有白话译本。文言、浅近文言、白话 3 种不同语体交叉运用,逐渐经历了由“雅”趋“俗”,即由文言趋向白话的演变过程^[20]。

鲁迅^[21]认为:文学具有普遍性,但由于读者的体验不同会有变化,一旦读者没有类似的体验,文学也就失去了效力。鲁迅早年效仿过严复和林琴南的译笔,翻译用的是文言,1903 年到 1906 年间鲁迅的翻译是文白相间的:翻译文学文本,预期读者为新兴市民阶层,采用文白相间的语体;翻译科技文本,采用雅洁的古文,更可能被饱读诗书的读者群所接受。从留日后期到民国初年,鲁迅的思想观念在不断转变,由“立国”到“立人”,并体现在译作语体上。古文字学家章太炎 1908—1909 年在日讲学,周氏兄弟听了章太炎先生的讲论,深受其古奥艰涩的文体影响,在多数译作中系统地采用了先秦的语体。1909 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正是那一时期的结果。

周氏兄弟译介《域外小说集》,以西方文化或原语文化为取向,主张再现作品的异域情调,保持原汁原味。主要以先秦古汉语为主,辅以欧化句法忠实翻译:句法上系统地采用了欧化的标点符号;词法上“悉如原音”地输入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词。期待的读者是熟读古书,有钱有闲的阶层,但古奥的句子和冷僻的字眼令人无法卒读。鲁迅在序言中也认为译文句子生硬,诘屈聱牙,配不上重印^[22]。希望中国读者主动去接近、认可和接受西方文化和文学作品,要求读者硬着头皮读下去^[23]。

清末民初的读者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对西方文化缺乏了解,周氏兄弟预期的读者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但他们大多喜欢通顺流畅的意译,晦涩生硬的文体可读性较差,不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情趣和阅读习惯。林语堂认为,鲁迅译文文法艰涩、句法繁琐,比读天书还难^[24]。要发挥翻译作品的社会作用,译者的语体要和主流的语体契合,迁就读者的接受能力,采用译界普遍采用的、为多数读者所认同和接受的语体。

3 结 语

《域外小说集》的译介充分体现了周氏兄弟的翻译观和审美情趣,没有像侦探小说那样畅销,源于其在选材、文学形式、翻译手法和翻译语体等方面与当时一般读者的阅读经验不合,缺乏本土文学经验和接受土壤,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周氏兄弟苦心孤诣的译作缺乏广大的读者群,传播面极窄,没有达到预想的

启蒙作用,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种审美活动,文学作品能否实现其价值,取决于文本的传播和读者的接受,而文学翻译则涉及更多的因素:作者、译者和读者,译者除了忠实于作者外,还必须站在读者的角度,以读者的可接受性为基础。《域外小说集》读者接受的失败,充分说明了翻译过程中关照意向读者期待视野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 [1] 王友贵. 翻译家鲁迅[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 [2] 鲁迅. 鲁迅 1932 年 1 月 6 日给增田涉信[M]//鲁迅全集:第 13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71-474.
- [3]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 [4] 叶依群.《域外小说集》译介研究[J].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2013,25(2):88-91,116.
- [5] 温斌. 试论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J]. 阴山学刊,1993(3):27-32.
- [6]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7]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M]//鲁迅全集:第 10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5-156.
- [8] 王宏志. 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M]//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63-172.
- [9] 邹振环.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 [10] 鲁迅.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全集:第 4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11-514.
- [11]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M]//域外小说集. 长沙:岳麓书社,1986:5-6.
- [12] 刘少勤. 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与翻译[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 [13] 郭延礼.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 [14] 鲁迅.《域外小说集》二序[M]//鲁迅全集:第 10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3-164.
- [15] 顾均. 周氏兄弟与《域外小说集》[J]. 鲁迅研究月刊,2005(5):32-42.
- [16] 黄琼英. 鲁迅与《域外小说集》的翻译[J]. 外语研究,2006(3):52-55.
- [17] 王宏志. “人的文学”之“哀弦篇”:论周作人与《域外小说集》[M]//翻译与文学之间.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42-246.
- [18] 王宏志. 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J]. 鲁迅研究月刊,1995(3):47-58.
- [19] 许寿棠. 亡友鲁迅印象记[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0] 谈小兰. 晚清翻译小说的文体演变及其文化阐释[J]. 明清小说研究,2004(3):190-200.
- [21] 鲁迅. 鲁迅全集:第 11 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2] 鲁迅. 鲁迅全集:第 10 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3] 廖七一. 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翻译规范的失与得[J]. 外语研究,2009(6):64-69,112.
- [24] 鲁迅. 鲁迅全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